

【学术书评】

华校传授比英校更前卫的性别观念？

读《离散者的学校教育》的反思

Chinese Schools Inculcated more Avant-Garde Gender Ideologies than English Schools? A Critical Review on Schooling Diaspora

黄庭康* (台湾中央研究院)

Ting-Hong Wong
Academia Sinica, Taiwan
E-mail: thwong@gate.sinica.edu.tw

Published online: 31 December 2020

To cite this article (APA): Ting-Hong, W. (2020). 华校传授比英校更前卫的性别观念？读《离散者的学校教育》的反思.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 1(2), 209-215.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1.2.10.2020>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1.2.10.2020>

摘要

Schooling Diaspora 从性别角度探讨从 1850 到 1960 年代新加坡及马来亚的华人女子教育。该段时间西方传教士、土生华人、及新客华人都有参与营办女子学校。教会及峇峇的女校以英文教学，模仿欧洲的教育模式；新客办理的华校以华文教学，课程受中国影响。该书指出尽管华文女校的性别社教化有保守一面，它们传播的性别观念比英文女校的前卫，因为华校课程有“非性别特定”的特性，没有像英校般提供专为女生而设的课程；又传递先进的性别意识、鼓励学生走出家庭实现自我；并藉课堂教导、课外活动、及参与社会政治事务提高学生的政治意识。*Schooling Diaspora* 有力的呈现女子教育对族群政治的重要作用。然而该

*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书专注于女校、忽略了男女合校的女生的教育经验。此外，笔者认为该书作者需要进行更严格的比较以证明华校确实传授比英校前卫的性别意识。

关键词： 女子教育、华文学校、英文学校、新加坡、马来亚

Abstract

Schooling Diaspora examine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nd British Malaya from the 1850s to the 1960s through a perspective of gender study. During that period young Chinese females in the two territories attended three types of girls' schools—English schools operated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English institutions run by the Straits-Chinese, and Chinese schools established by the Chinese-born, newly arrived Chinese. Both English schools followed the pedagogic model of Europe; while Chinese schools adopted the model of China. Though their teaching regarding women's roles were traditional and conservative in some ways, Chinese girls' inculcated more modern and avant-garde gender ideologies than their English counterparts, as they adopted a non-gender specific curriculum, encouraged students to venture into and realize themselves in the public sphere, and raised students'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through classroom teaching and other activities. *Schooling Diaspora* powerfully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women's education in the reproduction of ethnic groups. But the book can be improved by researching also Chinese girls' education experiences in co-educational schools and comparing more rigorously gender socialization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schools.

Keywords: Women's education, Chinese schools, English schools, Singapore, Malaya

Karen M. Teoh, *Schooling Diaspora—Women, Education,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British Malaya and Singapore, 1850s-196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248 pages.

ISBN: 978-0190495619

华文教育一向是海外华人研究的核心课题,相关的学术专书及论文多如汗牛充栋。然而,就笔者所知,Karen M. Teoh 的 *Schooling Diaspora: Women, Education,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British Malaya and Singapore, 1850s-1960s* 是第一部探讨新加坡及英属马来亚地区华人女子教育的英文学术著作。该书涵盖从 1850 年代到 1960 年代、超过一世纪新马女子教育的历史演变。在该段时间两地经历了英国殖民统治、中国民族主义兴起、反殖民运动、以及去殖民化独立建国等多个历史阶段。有别于大部分海外华人教育研究作品,Teoh 讨论的范围不局限于华校(由华人兴办、用中文作教学语言的学校),它还包括由西方教会及“土生华人”(Straits-born Chinese、又称峇峇或 Peranakan)营办、采用英语教学、但因为历史因素大部分学生是华人的英文女校。因为研究学校类型具多样性,该书能够呈现殖民当局、海外宣教团体、土生华人、及“新客”华人(从大约十九世纪末才移居东南亚的华人)等群体对女子教育的不同理念,比较他们的学校对新马华人女性及社会的冲击。Teoh 认为新加坡及马来亚华人女子教育带来矛盾的影响,它一方面巩固了既有的社会文化规范、延续两性不平等;但同时为女性开拓了更多的机会,让她们可以有不一样的人生规划,以及选择在公领域扮演更多元的角色。

新马地区女子教育肇始于十九世纪中叶。因为英殖民统治者对教育采放任自由(laissez-faire)政策,欧洲天主教及基督教会宣教士成为在两地办学——包括办理女子学校——的先锋。教会营办的女子学校以英语教学,原初收生对象只局限于在地欧洲殖民者的子女,但后来接受殖民政府财政补助、按规定须开放让其他族群学生入读,所以亦录取马来、印度、及华人女生。也许因为华人较有意识藉教育争取更高的阶级位置,加上“新客”涌入导致华人在整体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到了二十世纪初期,这些英文学校的学生以华裔占大多数。传教士营办的女校是西方帝国主义者文明化企划(civilizing project)的一部份,它们的课程模仿欧洲女子学校的模式,目的是培养上层社会的精致女性文化(refined femininity)。教会女校培育出一群接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女性,它们把学生的语言、

文化、及身份认同同化到接近殖民者。西方式的教育也让学生们取得不一样的教育、就业、及婚姻机会。

随着“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在 1899 年创校，土生华人成为营办女子教育的另一股力量。土生华人是早期（可能早至十六、十七世纪时）华人移民的后裔。因为中国政府在 1893 年才撤除海禁，十九世纪中后期之前海外华人移民社群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男性华人只能与在地马来女子结婚。因为母亲是马来人，早期华人移民的后裔（土生华人）在中华文化淡薄的环境下成长，渐渐失落了华人语言及文化。有部分峇峇在没有华人文化包袱下入读英文学校，语言及文化被殖民者同化，之后成为专业人士（例如律师及医生等）、甚至成为被殖民者拢络的菁英。土生华人数虽少，但在殖民地甚有社会地位。然而，二十世纪初期“新客”数目日益庞大，不少新移居的华人凭着打拼精神在经济领域取得成就，人数有限的土生华人感到受威胁，意识到必须自强以维持在华人圈的领导地位，而自强的第一步就是在文化上改造社群内女性（“娘惹”）。如上所述，许多土生华人的妻子是在地马来人，在殖民者及华人眼中马来族群及文化都是较落后次等的。峇峇们认为要维持己群的素质，就必须把娘惹“去马来化”、现代化、及英化。此外，为了要向殖民者及“新客”华人展示中国性（Chineseness），以维持新马地区华人领导者的地位，林文庆及宋旺相等土生华人领袖发动复兴儒家文化运动，声称要保留发扬中国文化有价值的部分。因为这些背景因素，峇峇办理的女子学校都以英语教学、也接受殖民政府财政补助、课程也像教会学校般追随英国的模式、也以欧洲人担任校长（一直到 1951 年），但教学内容却包括华文及马来文。

然而，西方教会及土生华人营办的学校数量有限，从 1850 到 1960 年代新马地区大部分接受教育的华人女性就学于华文学校。“新客”华人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在两地创办女子学校，其后因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华文女子学校数量快速增长，到了 1930 年代末期新马地区共有超过五十所华文女校，学校及学生数量都远远抛离英文学校。华校以延续华人语言文化，帮助建设富强中国为目的。英国人在辛亥革命后，就意识到华校的中国民族主义威胁殖民地的政治稳定。为了更有效控制华文学校，殖民者制订办法要补助华校，但华人社群怀疑英国人背后的动机，一直对接受补助抱保留态度。

Teoh 认为华文女校宣扬的性别观念具有矛盾性。华校要求学生外表端庄、言行举止温文、又教导她们日后要扮演贤妻良母等传统女性角色，在性别文化上有保守的一面。然而华文女校比英文女校更能推动性别观念的现代化。首先，华文学校课程具有“非性别特定”（non-gender specific）的特点。华校男校、女校

及男、女生的课程基本上完全一样，不像英文学校及马来学校般设有专为女生而设的课程——例如英校的家政，马来学校的编织、烹饪等。华校课程非性别特定，因为它们跟随受到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冲击后高举科学与民主、讲求男女平等的中国课程模式所影响。华文女校又向学生传授两性平等及较前卫的女性角色观念，鼓励他们走出家庭在公领域实现理想发挥所长。华校女生又藉课堂学习、课外活动、及参与社会运动提升政治意识，不少华文女校校友终其一生都积极参与政治。Teoh 以“现代化的保守主义”（modernizing conservatism）形容华文女校这矛盾的性别文化。

Teoh 相信有两个因素帮助华校长时间维持前卫的性别观念。首先是空间距离阻隔了中国保守文化对海外华校的冲击。国民党在 1930 年代藉新生活运动宣扬保守的传统文化（包括性别文化），然而远在东南亚的新加坡及马来亚华校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继续传递受五四及新文化运动冲击后较激进的一套。另外，英殖民政府一直视华校最大的威胁来自它们宣扬的中国民族主义，而并非性别意识。因此，殖民地视学官一直关注英校及马来学校是否有把女生教导为符合殖民者期待、而且有助稳定殖民统治的女性，但却从来没有干涉华校的“非性别特定”课程及关于性别观念的教导。

Schooling Diaspora 是一部文笔流畅，非常富有启发性的学术佳作。笔者二十多年前开始研究新马华文教育，然而一直没有注意华教的性别议题。Teoh 的作品从性别研究的角度探讨海外华人教育，她的论述让我明白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任何一个社群想要延续或者扩大影响力，都必须解决再生产（reproduction）——包括生物性的再生产及语言文化的再生产——的问题；以语言文化建立集体认同的群体，尤其需要确保语言文化的再生产，保证下一代继续保有族群语言文化。因为母亲对孩子最早期的教化（socialization）、语言发展、及文化认同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女性对族群文化再生产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因此，所有希望延续及扩大权力的族群都会关心己族女子的教育，都要确保学校体系帮助保存族群语言文化，同时为己群男子提供数量足够、有助传承文化的女性作为婚姻对象。同样，所有试图改变、甚至消灭被统治族群身分认同的统治者也可能会从女子教育入手，变更被宰制族群女性的语言及文化、阻断该族群文化的再生产。*Schooling Diaspora* 让我明白到研究族群教育绝对不能忽视女性教育的议题。

另外，*Schooling Diaspora* 提出了许多细腻、富有洞见的观察。笔者尤其喜欢该书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土生华人的分析。该段论述具体的呈现在“新客”

华人势力抬头时，人数占少数、在文化上什么都有但又什么都不是的峇峇的微妙处境及内心的焦虑，加深了我对土生华人的了解。

然而，*Schooling Diaspora* 也许还有一些可以有待进一步厘清的问题。首先，女校并非女性接受教育的唯一选择，二十世纪许多新马地区女生就读于男女共学（co-education）的学校。往后的研究也许可以探讨男女共学学校所传递的性别观念，以及跟女校作比较，看看两类型学校女生的性别意识及后来的婚姻、工作、社会参与等可有差别。这样的对照也许更能凸显女校性别社教化的特性。其次，Teoh 提及到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土生华人试图藉营办学校在文化上改变娘惹。笔者很好奇入读这些学校的华人女生的背景，希望知道她们是土生华人、还是新客的女儿占多数，从而评估土生华人的学校如何发挥文化再生产功能——是通过改造己群女子文化、还是藉对外吸收新成员？此外，*Schooling Diaspora* 指出相比英文学校，华校采用“非性别专门”课程，传递的性别意识比英校的更前卫、更现代。这观点与许多人以为受西方影响的英校比较现代、华校比较守旧的常识想象有落差，是一个非常具启发性及挑衅性（provocative）的命题。然而这讲法需要接受更严谨的验证。首先，Teoh 的分析并没有“平等对待”英文及华文女子学校。比方说，她在书中第 105 页指出尽管在 1930 年代有部分华文女子中学开设“家事”这女生科目，但因为只占一星期三四小时的上课时间的一小时，该科目对性别意识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Teoh 没有以同样的批判态度质疑专为女生而设科目在英文学校的实际影响。她没有考查英校专为女生而设科目在总教学时数所占比例、评估家政等科目在英校被重视的程度，以及对性别意识的作用。另外，*Schooling Diaspora* 指华校藉灌输崭新的性别观念、提高女生政治意识、及鼓励她们参与社会事务等方法促进性别平等化。然而，如果要证明华文女校教导的性别观念英校的更先进，Teoh 需要更有系统的搜集英文女校的数据，更深入了解它们的实际教学、它们的课外活动、以及它们如何诠释、执行、改变、甚至扭曲课程大纲的原意传递不一样的性别观念。

最后，笔者阅读 *Schooling Diaspora* 时想起大约十年前，在国立新加坡大学新马研究特藏看过的一份新加坡教育部的研究报告。该研究调查 1970 年代中期四十六所接受政府补助的华校及英文学校校长的背景。报告显示华文学校有很高比例的校长是（年长的）男性，但英文学校却是（年纪较轻的）女校长居多。¹这数据显示华文教育圈比较父权、更多由男性主导，英文学校比较现代化、女性的晋升机会不输男性。笔者对这差别的解读是英文学校很早便被吸纳入公立教育体

¹A Profile Study: 1976 Group of Government-Aided Secondary and Full School Principals (Planning and Review Branch,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1977).

系，科层化（bureaucratization）的程度较高，聘任及升迁都按照客观的学历、资历、及规则，女性较有机会爬升到领导位置；但华文学校传统上由华人办学团体组成的董事会（成员极可能绝大部分是男性）掌控，人事较缺乏制度，女性不容易晋升成为主管。当然，该项研究的对象包括男校及男女合校，涵盖的年代也跟 *Schooling Diaspora* 的不一样，但它的发现还是刺激了笔者对对华文教育与性别的议题提出了更多的问题：跟西方教会及土生华人办理的女校相比，1960 年代以前新马地区华文女校是否有更高比例由女性担任校长？这些女校长有什么特征？她们的家庭生活、领导风格、及政治立场如何？华文学校女校长跟英文学校的有什么差异？华文女校的董事会跟华文男校的有否不一样？女校的董事会会否有更多女性成员？学校校长及董事会这些背景特征传递出来的性别讯息是什么？有没有影响学校的性别社教化？